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安哥拉的內戰與和平協議（一九七五～二〇〇二年）

Angola's Civil War and Peace Accords:1975-2002

doi:10.30390/ISC.200404_43(2).0002

問題與研究, 43(2), 2004

Issues & Studies, 43(2), 2004

作者/Author：嚴震生(Chen-Shen J. Yen)

頁數/Page：31-6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4_43\(2\).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4_43(2).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安哥拉的內戰與和平協議

(一九七五~二〇〇二年)

嚴震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歐美所研究員)

摘 要

二〇〇二年三月，安哥拉叛軍游擊隊UNITA領袖薩文比遭政府軍圍剿格殺，MPLA 政府隨即片面宣佈停止軍事行動，並表示願意特赦叛軍，以期達到和解。雙方於四月初簽署停火協定，並展開解除武裝的行動，預定在兩年後舉行大選。安哥拉自一九七五年獨立以來，就陷入長期的內戰狀態，MPLA 和 UNITA 過去也曾三度達成和平協議，但最終都執行受阻，無法結束內戰。

在過去二、三十年的非洲戰爭中，大多數是屬於內戰或革命游擊戰，其中不少波及鄰國或有鄰國（或明或暗地）支持內戰的一方，而形成區域性的衝突，^①但鮮少有區域以外的國家密切或直接涉入，安哥拉是唯一的例外。安哥拉內戰是冷戰期間東西對抗的指標性案例。它的內戰有南非及古巴的直接介入，也有美、蘇強權的間接干預；同樣地，它的幾次和平協議亦有國際社會的介入。安哥拉的衝突並沒有因為冷戰結束、蘇聯解體而有所緩和。九〇年代雖有兩次新的和平協議，但都未能達到結束內戰的目的。安哥拉國內持續衝突的困境，倒是在薩文比猝死後出現了新的契機，和平進程有了希望的曙光。

關鍵詞：安哥拉、薩文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哥拉完全獨立國家聯盟、盧沙卡和議、停火協定、解除武裝

* * *

註① 以一九九〇年代為例，賴比瑞亞 (Liberia) 與獅子山 (Sierra Leone) 的內戰衝突有許多區域國家如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及幾內亞 (Guinea) 等暗中支持作戰中的不同派系或叛軍，甚至有區域組織西非經濟共同體的停火監督團 ECOMOG 的介入干預；在薩伊 (Zaire) 內戰中，叛軍領導人卡畢拉 (Laurent Kabila) 獲得烏干達 (Uganda) 及盧安達 (Rwanda) 支持，而擊敗莫布杜 (Mobutu Sese Seko) 取得政權，但旋即又有新的內戰發生，接續薩伊的剛果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簡稱 DRC) 周邊國家幾乎全都間接牽涉在內。

壹、前言

位於西南非洲的安哥拉 (Angola) 在二〇〇二年初經歷了相當重要的政治變化，先是反對勢力游擊隊領袖薩文比 (Jonas Savimbi) 於二月下旬在內戰中遭到格殺，^②接著是叛軍和政府在三月初達成新一回合的停火協議。^③安哥拉的長期衝突及內戰，似乎將告一段落。未來該國政治是否趨於穩定，仍會有區域性的影響，值得觀察。本文探討安哥拉內戰興起及持續的原因、國際強權的介入、及內戰中達成的各項和平協議，並試圖釐清為何冷戰的結束無法終結安哥拉的衝突。在分析架構方面，則與個人過去在討論獅子山及賴比瑞亞內戰的架構相同，就是以過去非洲國家類似的發展為基礎，包括了 (一) 導致內部衝突、內戰爆發及內戰持續的因素、(二) 影響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三) 內戰結束的各種形式。

貳、基本分析架構

非洲國家自一九六〇年獨立以來就持續有內戰的爆發，從六〇年代奈及利亞 (Nigeria) 的比弗拉戰爭 (Biafra War) 到七〇年代的查德 (Chad) 內戰；從八〇年代烏干達的武裝鬥爭到九〇年代賴比瑞亞及薩伊的內戰，非洲的內戰始終未能完全平息。在二十一世紀初，又有象牙海岸這個一向政治穩定的西非國家，因內部衝突而陷入全國一分為二的情形。倒是自七〇年代中期就開始的安哥拉內戰及九〇年代開始的獅子山內戰分別在二〇〇二年告一段落。導致這些內戰的因素不盡然相同，外力的介入多少亦會影響內戰的走向。當然，內戰結束的形式亦有所差異。

一、導致內部衝突、內戰爆發及內戰持續的因素

導致非洲各國持續發生內戰的因素很多，包括族群的衝突、宗教信仰的迥異、意識形態的爭議、軍人的干政、區域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威權領導的少數統治、及政府本身的脆弱等。^④因族群衝突而引發內戰的案例比比皆是，奈及利亞的比弗拉戰爭

註② “Savimbi ‘Died with Gun in Hand,’” *BBC News*, February 25, 2002, <http://news.bbc.co.uk/1/hi/english/world/africa/newsid_1839000/1839252.stm>.

註③ Justin Pearce, “Angola to End Civil War,” *BBC News*, April 4,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1910017.stm>>; Rachel L. Swarns, “Angolans Cheer the Peace and Hope It Will Stay Awhile,”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2, <<http://www.nytimes.com/2002/04/05/international/africa/05ANGO.html>>.

註④ 有關非洲衝突與內戰的討論，請參考 Adebayo Adedeji, ed., *Comprehending and Mastering African Conflicts: 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Peace & Good Gover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1999); Taisier M. Ali & Robert O. Matthews eds., *Civil Wars in Africa: Roots and Resolution*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ymond W. Copson, *Africa’s War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 (Armonk & London: M. E. Sharpe, 1994); Monique Mekenkamp, Paul van Tongeren and Hans van der Veen, *Searching for Peace in Africa: An Overview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Platform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99)。

是六〇年代最著名的族群戰爭，盧安達的種族滅絕（genocide）則是九〇年代的代表；比弗拉戰爭亦有其宗教信仰迥異的層面，但因宗教信仰而引發內戰衝突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蘇丹（Sudan）境內南部基督徒和北部伊斯蘭教信徒間的衝突；基於對不同意識形態的執著而爆發內戰的例子不多，莫三比克（Mozambique）的內戰有其意識形態對立的一面。區域性發展的不平衡，特別是貧窮，雖然並不是大部份非洲內戰的起因，但卻是造成它持續的重要因素，獅子山和賴比瑞亞的內戰相當程度上受到貧窮的影響。威權領導人的少數統治幾乎存在於大部份的非洲內戰中，比較明顯的是薩伊和接續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及九二年以前的莫三比克。最後，政府本身的脆弱，當然容易給予反對勢力進行武力抗爭的機會，也是造成內戰遲遲無法終結的因素，索馬利亞（Somalia）的幾近無政府狀態及獅子山搖搖欲墜的文人政府是這方面的實例。

安哥拉的內戰當然有其族群衝突的因素，但宗教信仰卻沒有扮演任何加重衝突的角色，倒是地域與族群因素有所結合。安哥拉各派系間的意識形態確實是有差異，但更為重要的是反映其意識形態差異背後的美國與蘇聯等國際勢力的對抗。此外，安哥拉內戰持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薩文比的人格特質。只有在他身亡之後，安哥拉人民才見到和平的曙光。

二、影響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

非洲國家之間彼此發生戰爭的機率很低，^⑤但是內戰波及鄰國、鄰近國家支持叛軍、或是區域性與國際性組織及重要政治人物的介入，則是相當平常的事。就以一九九〇年代的內戰來說，賴比瑞亞的內戰波及到獅子山；蒲隆地（Burundi）的內戰造成難民湧入薩伊、坦尚尼亞及盧安達。象牙海岸及布吉納法索在賴比瑞亞內戰中支持賴比瑞亞民族愛國陣線（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簡稱為 NPFL）的泰勒（Charles Taylor）；在薩伊的內戰中，叛軍領袖卡畢拉因獲得盧安達、烏干達、安哥拉及剛果共和國的支持，而終能推翻莫布杜政權；在安哥拉協助下，剛果共和國前總統沙壽一恩奎索（Denis Sassou-Nguesso）經歷了四個月的內戰，又奪回其五年前在選舉中丟掉的權位。西非國家經濟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ECOWAS）則是在奈及利亞的主導下，介入賴比瑞亞與獅子山的內戰；在非洲享有相當地位的前坦尚尼亞總統尼文瑞（Julius Nyerere），企圖調解蒲隆地的內戰；聯合國則是在這些衝突中，屢屢出面調停，或是扮演人道救援及維持和平的角色。

在安哥拉的內戰方面，國際因素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先前提過的美國與蘇聯外，中共、南非、及古巴都是直接或間接介入的背後力量。薩文比就是有來自南非的奧援，方能持續在安哥拉進行游擊戰。此外，安哥拉週邊的尚比亞（Zambia）、

註⑤ 少數的兩個重要實例包括了衣索匹亞（Ethiopia）與索馬利亞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在奧加丹（Ogadan）的衝突，及坦尚尼亞（Tanzania）在一九七九年入侵烏干達，但即使在這兩個例子中，前者是一國對另一國境內同一民族進行分離主義的戰爭（irredentist war），而後者則是協助鄰國恢復秩序的人道干預。此外，衣索匹亞與厄利垂亞（Eritrea）間的衝突，則是由後者獨立前的內戰演變成獨立後的國際戰爭。

DRC、剛果共和國及納米比亞（Namibia）亦被牽涉在內。當然，前殖民母國的葡萄牙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這些國家或是支持內戰中不同的派系，或是企圖推動和平協議，多少都影響著內戰的走向。聯合國則是在和平協議的執行方面，有所貢獻。

三、內戰結束、走向和平的可能途徑

除了持續衝突外，非洲國家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幾個可能的途徑是：（一）內戰的一方（或藉外力、或憑本身的力量）最終以武力戰勝另一方，迫使其領導人流亡海外，交出政權，如一九九七年薩伊的卡畢拉擊敗莫布杜政權，或是三十年前奈及利亞中央政府擊敗想要獨立脫離聯邦的比弗拉，甚至是二〇〇二年安哥拉內戰因UNITA領導人薩文比被政府軍擊斃而促成和平協議也可以算是這一類的內戰結束方式；（二）內戰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協議，以民主選舉決定國家未來的統治者，如一九九四年的莫三比克及一九九二年的安哥拉；（三）內戰中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和平協議，分享治權及統轄領域，如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索馬利亞；（四）內戰雙方達成協議，叛軍領導人加入政府，分享政權，如一九九九年的獅子山。

除了第一類的軍事勝利形式外，其他三種形式內戰的結束往往是透過國際勢力的介入，達成停火以至於和平協議。國際勢力是否願意介入又取決於發生內戰國家的動亂是否波及鄰國、它內戰一方的族群是否還散佈在附近鄰國、它本身是否有介入其他國家的內戰、它的天然資源及戰略物資的蘊藏、此內戰的國際意涵等各種國內、區域及國際因素的考量。在安哥拉內戰方面，由於其具有豐富的礦藏資源，而國內的族群中亦有跨國散佈的情形，加上它的內戰影響到南非在納米比亞的統治，因此自然會有國際勢力介入，希望促成和平協議。不過，和平協議是在冷戰末期，美蘇關係改善之際方才展開，也證明國際環境的配合有其必要。

在這四種結束內戰的形式中，第三類休戰後各自掌控轄區的例子極少，第二類的形式最多，但這些國家卻也不見得在民主選舉後就能完全脫離動亂，特別是選舉的結果不為一方所接受時，內戰隨時有可能再度爆發，安哥拉的一九九二年選舉就是一個實例。第一類軍事勝利的例子照理來說應是最具穩定性，但是卡畢拉在擊敗莫布杜後，卻面臨過去背後支持力量的盧安達及烏干達轉而支持新的叛軍與其對抗，可見卡畢拉的獲勝不完全是其軍事力量的勝利，而是莫布杜遭西方國家放棄，政權崩潰的結果。第四類分享政權的例子雖然是一個代價較低，比較容易達成的妥協，但若是互信不足，則難以持續，賴比瑞亞一九九五年及獅子山一九九九年的和平協議最終未能成功就是兩個實例。在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的象牙海岸內戰中，法國從中斡旋，企圖以分享政權的方式讓交戰各方達成和平協議，結束內戰，能否成功仍待觀察。

在使用以上的分析架構來探討安哥拉內戰的經緯之前，首先我們要對安哥拉的歷史及人文背景，略作介紹。其次，內戰的爆發、國際勢力的介入、內戰的持續、和平協議的締結、民主總統大選的舉行、及內戰再起和終結等政治演變也必須詳加說明。在對歷史、人文背景及內戰過程有所瞭解後，本文將再就此分析架構來探討（一）導致國內衝突及內戰爆發的因素、（二）影響安哥拉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三）

安哥拉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途徑。由於過去研究安哥拉的中文文獻還算豐富，因此有必要先作一介紹，藉以說明本文是以這些文獻為基礎，而所完成的論述誠乃前輩研究的延續。

叁、中文期刊文獻

相較於其他非洲國家較少有具體的研究，安哥拉在獨立前後及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曾受到國內學者相當程度的重視，這當然和其內戰具有極為複雜的國際層面有關。早期研究非洲的學者如金神保、楊逢泰及張麟徵等，都曾在一九七〇年代對此曾在東西冷戰期間具指標性的非洲國家有密集的研究。^⑥此外，與安哥拉和平息息相關的西南非納米比亞獨立問題，亦是楊逢泰教授研究的對象。^⑦

在八〇年代末期有關古巴自安哥拉撤軍的研究，則有劉天均研究員的兩篇論文值得參考。^⑧除了中文文獻外，現任外交部歐洲司林永樂司長曾以英文發表有關安哥拉—納米比亞和議的論文，亦極具參考價值。^⑨可惜的是在安哥拉歷經兩次和議、國會和總統選舉、及內戰再起的九〇年代，國內學者並沒有再作相關的研究。在薩文比遭到格殺、UNITA再次步上談判桌、安哥拉內戰極有可能真正告一段落的今日，吾人實有必要對此非洲國家過去近三十年的國內衝突及國際介入再作詳盡的介紹。

肆、人文地理及歷史背景

安哥拉位於西南非洲，東與尚比亞接壤，東北及北部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所環繞，南為納米比亞，西鄰大西洋，土地面積近一百二十五萬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三十五

註⑥ 金神保，「葡萄牙對非新政策之透視」，*問題與研究*，第10卷第5期（民國60年2月），頁50~52；「葡屬安哥拉的民族主義運動」，*問題與研究*，第11卷第1期（民國60年10月），頁61~64；張麟徵，「安哥拉戰亂的回顧、分析、展望」，*問題與研究*，第15卷第6期（民國65年6月），頁53~59；「安哥拉戰亂何時了？」，*問題與研究*，第15卷第3期（民國64年12月），頁68~74；楊逢泰，「葡屬非洲往何處去」，*問題與研究*，第13卷第8期（民國63年5月），頁66~70；「安哥拉戰亂面面觀」，*問題與研究*，第15卷第5期（民國65年2月），頁43~48；「安哥拉戰亂的餘波」，*問題與研究*，第15卷第6期（民國65年3月），頁49~52；「安哥拉事件後之南部非洲」，*問題與研究*，第15卷第7期（民國65年4月），頁59~64。

註⑦ 楊逢泰，「西南非獨立問題」，*問題與研究*，第18卷第3期（民國67年12月），頁83~92；「納米比亞：一個『難解的結』」，*問題與研究*，第22卷第1期（民國71年10月），頁91~102。

註⑧ 劉天均，「古巴介入安哥拉內戰及其對非洲南部之影響」，*問題與研究*，第28期第3卷（民國77年12月），頁54~63；劉天均，「古巴自安哥拉撤軍與那米比亞獨立—兼論西南非區域安全問題」，*問題與研究*，第29期第3卷（民國78年12月），頁46~57。

註⑨ Yung-lo Lin,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Looking to the Future," *Issues & Studies*, Vol. 26, No. 9 (September 1990), pp. 111~130.

倍。安哥拉領土有一小部份被剛果分開，就是西北角的卡賓達（Cabinda），^⑩這裏的居民在文化方面，與剛果親近的程度超過和安哥拉的關係，加上有豐富的石油蘊藏，足以在財政上自給自足，因此卡賓達有分離主義運動就不足為奇，但它被牽涉到內戰中的程度相當有限。^⑪

若以土地面積計算，安哥拉是非洲第七大國，^⑫但人口僅一千一百多萬，差不多是我國人口的一半，可以說是人口密度相當低的國家，人口總數在非洲排名僅僅是第二十位。^⑬至於人種方面，來自葡萄牙的白人在十五世紀進駐此地時，除了奴隸的買賣外，與內陸的黑人並沒有太多的接觸。不過，在經歷了五百年的殖民接觸後，安哥拉的人種，特別是沿海葡萄牙實際統治的地區，自然會發生局部的變化。

除了白人外，有不少的安哥拉人是黑白混血（*mestiços*），當然大多數的安哥拉人是原住民的黑人。在這些黑人中，至少包括了近百個不同的族群，其中三個族群人數最多，約佔人口的三分之二。他們分別是散佈於北邊的巴剛果人（*Bakongo*）、中部西岸一帶的金布恩杜人（*Kimbundu*）、以及中南部地區的歐維布恩杜人（*Ovimbundu*），其中歐維布恩杜人最多，佔總人口三分之一，其次是金布恩杜的四分之一及巴剛果人的八分之一。我們在後續的討論中，將會檢視這些族群在內戰衝突及各交戰團體中所扮演的角色。

至於宗教信仰方面，由於葡萄牙是天主教國家，而西南非洲也是少數伊斯蘭教沒有進入的地區，因此安哥拉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的天主教徒、百分之二十的基督教徒，以及百分之四十的傳統信仰。伊斯蘭教在安哥拉的信徒不多，大多數是在內戰中成為難民並在其他國家皈依後，再將信仰帶回國內，因此沒有太長的歷史，因此類似西非地區或蘇丹等國長期飽受宗教對立的經驗，並非安哥拉內戰衝突的一個原因。

安哥拉有相當豐富的礦藏及天然資源，其中石油日產一百萬桶以上，是外匯的最主要來源，^⑭鑽石、鐵礦、及木材的蘊藏量也頗豐富。農業方面，安哥拉的咖啡產量極高，是外銷的的大宗，其漁獲量亦相當可觀。很可惜的是，安哥拉的天然資源不但

註⑩ “Cabinda Separatists Attack Angola,” *BBC News*, April 20,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1940585.stm>>; “Angolan ‘Offensive’ in Cabinda,” *BBC News*, September 20,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2271768.stm>>; Justin Pearce, “Cabinda: Angola’s Forgotten War,” *BBC News*, October 18,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2229647.stm>>.

註⑪ 參見張麟徵，「安哥拉內戰何時了？」，頁70。

註⑫ 前六國依次為阿爾及利亞（Algeria）、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利比亞（Libya）、查德、及尼日（Niger），安哥拉土地面積略小於查德及尼日，而略大於馬利及南非。

註⑬ 前十國依次為奈及利亞、埃及（Egypt）、衣索匹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南非、坦尚尼亞、阿爾及利亞、蘇丹、摩洛哥（Morocco）、及肯亞（Kenya）。安哥拉人口甚至少於烏干達、迦納（Ghana）、莫三比克、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象牙海岸、喀麥隆（Cameroon）、辛巴威（Zimbabwe）、馬拉威（Malawi）、及馬利（Mali），而排名第二。

註⑭ 根據估計，二〇〇二年收益將可達四十億美元。參見 Mary Joannidis, “The Challenges of Peace in Angola: Humanitarian Disaster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ies,” *The Courier: The Magazine of ACP-EU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o. 195 (November-December 2002), p. 17.

未成爲其發展工業、進入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反成爲內戰中各交戰團體換取武器的工具，使內戰持續近三十年，可以說是造成國破人亡、百廢待舉的元兇之一。

一、殖民時期歷史

雖然大部份的非洲國家在一九六〇年代獨立之前，曾是英國或法國的殖民地，但包括安哥拉在內也有五個國家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⑮在英、法兩霸權於十八、九世紀控制非洲之前，葡萄牙曾在十五至十七世紀中葉以前，爲這個地區最重要的殖民帝國。自巴西獨立後，安哥拉就成爲葡萄牙在海外最有價值的殖民地，也是它與過去殖民帝國所剩下的光榮歷史較爲重要的連接。^⑯

葡萄牙人是在十五世紀末期控制了安哥拉西部海岸一帶，將其納入從該國經非洲進入亞洲航線的重要航點，也有永久性的殖民統治，但是大規模的移民則是始於一八七〇年代。在此之前，白人人口從未超過三千人。但隨著十九世紀末期歐洲列強在非洲的角逐瓜分、葡萄牙本身經濟的衰退、及葡國政府對移民政策的鼓勵，^⑰安哥拉白人人口逐漸增加，並在二十世紀中大幅成長，由一九四〇年的四萬四千人、一九五〇年的近八萬人、一九六〇年的十七萬三千人，以至一九七〇年的近三十萬人。^⑱雖然葡萄牙政府宣稱它所推動的是一個種族平等、說葡萄牙語（Lusophone）的族裔政策，但實際上在安哥拉所呈現地卻是一個階層的社會，白人高高在上，然後是混血種，接下來是同化人（*assimilados*），就是在文化上爲葡萄牙所同化，並且應該在社會與政治上與葡萄牙白人享有同等地位的黑人，^⑲最下層則是原住民的黑人。

相對於英、法兩國在二次戰後就開始處理殖民地的獨立問題，葡萄牙對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採取了非常不切實際的頑強壓制。由於英、法兩國本身在二次戰後仍有高度的政治及經濟實力，可以確保其殖民地在獨立後必須與母國間維持相當緊密的關係，因此這兩國對殖民地的爭取獨立較能採取寬容配合的態度。葡萄牙經濟實力的衰退及政治影響力的薄弱，使它不願也無法與民族主義的浪潮有所妥協。^⑳在一九六〇年非洲各殖民地紛紛獲得獨立之際，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不單有先前所提到的白人移民數字的增多，更嚴重的是政治高壓的加添，迫使知識份子及民族運動領袖流亡海外。^㉑

當安哥拉的民族主義份子眼見鄰近的剛果共和國及剛果，在一九六〇年時分別由

註⑮ 其餘四個是維德角（Cape Verde）、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聖多美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及莫三比克。

註⑯ Fernando Andresen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 3.

註⑰ Kenneth L. Adelman, "Report from Angola," *Foreign Affairs*, Vol. 53, No. 3 (April 1975), p. 558.

註⑱ Gerald Bender, *Angola under the Portuguese: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London: Heinemann, 1978), p. 20.

註⑲ 金神保，「葡屬安哥拉的民族主義運動」，頁 61。

註⑳ Bill Freu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ociety since 1800*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74.

註㉑ Phyllis M. Martin, "Peace in Angola?" *Current History*, Vol. 88, No. 538 (May 1989), p. 229.

法國及比利時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而葡萄牙卻沒有任何的安排甚至承諾，遂於一九六一年展開了武裝抗爭行動。安哥拉並非是唯一欲以武裝抗爭來獲取獨立的非洲殖民地。在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中，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及維德角同樣是有類似地的革命運動。^②此外，雖然英國及絕大部份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權轉移，但阿爾及利亞卻是藉由武裝抗爭才迫使法國放棄殖民統治，^③因此安哥拉並非一個特例。安哥拉的武裝抗爭持續長達十四年，在獨立後又經過二十七年的內戰，方才步入目前暫時的和平。

二、安哥拉的獨立革命運動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群安哥拉黑人居民攻擊首都魯安達（Luanda）的監獄，要求釋放囚犯，結果在與葡萄牙殖民政府的衝突中，有四十人喪生。這個暴力衝突引發了白人團體的報復，造成了數百人的傷亡。接著在三月時，北方巴剛果咖啡產地發生農民暴動，造成衝突的持續擴大，到夏天時，已有超過兩萬人死亡，其中有大約七百五十位是白人。^④不過，「一九六一年只是個起點」，^⑤反對殖民統治的組織早在五〇年代就已逐漸形成。

安哥拉自一九四〇年代末期開始就有反殖民統治的抗議，在殖民地有混血種及同化人推動安哥拉認同（Angolan identity）及民族自決；在海外的葡京里斯本及巴黎亦有反殖民統治的組織，裏應外合，企圖對葡萄牙政府施壓。^⑥不過，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於魯安達成立的兩個反殖民統治之組織，其中的一個就是目前的執政黨—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MPLA）。

（一）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MPLA 是在一九五六年由達克魯士（Viriato da Cruz）、馬洽多（Ilidio Machado）、及萊拉（Lúcio Lara）等年輕知識份子所組成，思想方面較為激進左傾。在MPLA早期的文宣當中，它宣稱「安哥拉的主權是完全屬於安哥拉的人民，並且不分族群、階級、性別、年齡、政治傾向、宗教信仰、或哲學理念」，^⑦但在實際的參與及支持者方面，卻是以混血種及同化人為主幹。由於MPLA是以曾被籠絡的安哥拉兩

註② 莫三比克的革命運動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cambique，FRELIMO）成立於一九六二年，幾內亞比索及維德角的革命運動則是由一九五六年所成立的幾內亞和維德角獨立非洲黨（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ência da Guiné e Cabo Verde，PAIGC）所領導。

註③ 阿爾及利亞是在國家解放陣線（Front Libération Nationale）領導下，歷經七年多的戰爭，方自法國統治下獲得獨立。

註④ George Wright, *The Destruction of a Nati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Angola Since 1945* (London and Chicago: Pluto Press, 1997), pp. 5~6.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 37.

註⑦ *Ibid.*



個較為「文明」的族群為主體，因此它的群眾基礎及影響力就侷限於都會地區，特別是魯安達及其向東延伸一帶的金布恩杜族，而無法深入廣大內陸的其他族群，也難獲得農民群眾的認同。^⑳

一九五九年，MPLA 被驅逐出魯安達，在領導人流亡到幾內亞、比屬剛果後，最後在法屬剛果的首都布拉薩維爾（Brazzaville）定下來，並以此為發動革命的總部。不過，由於 MPLA 在魯安達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因此一九六一年的衝突就是由其所主導發起的。^㉑

（二）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

另一支在五〇年代逐漸形成的獨立運動則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簡稱 FNLA），它的歷史較 MPLA 更早，前身是一九五四年在比屬剛果首都成立的北安哥拉人民聯盟（União das Populações do Norte de Angola，簡稱 UPNA）。先前曾提到的北方巴剛果人，不單是僅居住在安哥拉內，也有不少族人為了逃避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強迫勞動，而避居在比屬剛果，他們成立 UPNA 的目的是想要推動巴剛果民族主義，以恢復早年的剛果王國（Kingdom of Kongo）為職志，企圖將此地區由安哥拉分離，完成獨立。^㉒

UPNA 的羅伯托（Holden Roberto）在一九五八年時被選派代表該組織參與在迦納舉行的第一屆汎非組織會議，得以和非洲其他較為資深的民族主義領導人建立關係。由於有此機緣擴大視野，羅伯托因而決定將 UPNA 改為安哥拉人民同盟（União das Populações de Angola，簡稱 UPA），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㉓羅伯托不單將訴求的對象擴大，也開始走向國際，向聯合國提出託管安哥拉的建議，並建立了在美國的支持網路，儼然成為安哥拉革命運動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代言人。

UPA 成立後，MPLA 就有與其合作的意願，但羅伯托雖是民族主義者，卻不具左翼思想，因此兩個組織仍是各行其事。不過，由於 MPLA 發動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暴動後聲名大噪，^㉔也迫使 UPA 必須有所回應，以免失去其優勢。同年三月份在巴剛果地區的農民暴動，即由其策畫促成。一九六二年，UPA 和一個小黨安哥拉民主黨（Partido Democrático Angolano，PDA）合併成為 FNLA，並隨即成立了一個流亡政府—安哥拉流亡革命政府（Governo Revolucionário de Angola no Exílio，GRAE）。

如同 MPLA 的群眾基礎侷限於單一族群的金布恩杜族一般，UPA/FNLA 主要的支持力量亦來自單一的巴剛果族群。為了要擴大訴求，UPA 任命屬於歐維布恩杜族的薩文比為該組織的秘書長，希望獲得此安哥拉最大族群的認同。幾年後，薩文比離開了 UPA/FNLA，建立了一個以歐維布恩杜族為群眾基礎的武裝革命力量，就是安哥拉完

註⑳ 楊逢泰，「安哥拉戰亂面面觀」，頁 44；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 26.

註㉑ 張麟徵，「安哥拉內戰何時了？」，頁 68。

註㉒ Wright, *The Destruction of a Nation*, p. 2.

註㉓ Kenneth Ingham, *Politics in Modern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Chapter 9, "Angola: No Man's Land," p. 178.

註㉔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 53.

全獨立國家聯盟。^③

(三) 安哥拉完全獨立國家聯盟

一九六六年成立的安哥拉完全獨立國家聯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UNITA）是安哥拉反殖民統治的第三支武裝抗爭力量。雖然它成立的時間較晚，但其領導人薩文比卻早已有參加革命活動的經歷。

UNITA在成立之初，是以鄰近歐維布恩杜族的尚比亞國之首都盧沙卡（Lusaka）為基地，在一九六八年後才將主要的活動根據地遷回安哥拉。除了歐維布恩杜族外，另外兩個支持 UNITA 的力量來自於安哥拉全國學生聯盟（*União Nacional dos Estudantes Angolanos*，UNEA）及在尚比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卡坦加（Katanga）礦區工作的安哥拉人。^④前者是薩文比在 UPA 秘書長任內所建立的關係，^⑤後者則是來自地緣關係。

在意識形態方面，薩文比在離開 FNLA 時所提出的說詞中除了對羅伯托獨裁統治的不滿外，還包括了 UPA 及 GRAE 和美國帝國主義的關係過密及 FNLA 軍事行動失敗的指控。他也一度考慮要加入 MPLA，但對其軍事力量的薄弱相當失望。薩文比基本上是對中共的毛派農村革命理論較為傾心，也頗有研究。^⑥他認為唯有在流亡海外者都能返回安哥拉，讓反殖民運動在安哥拉境內生根，才有機會對葡萄牙施加壓力、形成挑戰。^⑦相較於 MPLA 的執著於馬克思主義之教條，及 FNLA 的保守民族主義，薩文比雖然採取了毛派農村革命模式，但卻不是狹隘的意識形態者（ideologue），在政治及外交上比較具彈性。薩文比充滿了個人魅力，UNITA 的群眾基礎又是安哥拉最大族群的歐維布恩杜族，因此在安哥拉獨立前，UNITA 是較被看好的一支武裝力量。^⑧

安哥拉的獨立革命運動在一開始就沒有單一的整合，這當然是和它的族群及地域的因素有關，意識形態的迥異也是另一個原因。不過，不同的國際力量在背後作選擇性的支持，亦與無法達成整合協議密不可分。^⑨我們會在討論完安哥拉獨立的進程之後，再對這些國際力量作個別的分析。

三、安哥拉的獨立進程

安哥拉的三支革命運動不單互信不足，無法整合，同時還彼此攻擊，削減了對

註③ John A. Marcum, "Lessons of Angola," *Foreign Affairs*, Vol. 54, No. 3 (April 1976), pp. 410~411.

註④ 金神保，「葡屬安哥拉的民族主義運動」，頁 63。

註⑤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 79.

註⑥ 張麟徵，「安哥拉內戰何時了？」，頁 69。

註⑦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p. 78~79.

註⑧ Adelman, "Report from Angola," p. 562.

註⑨ 張麟徵，「安哥拉戰亂的回顧、分析、展望」，頁 53。



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武裝力量。在安哥拉獨立之前，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薩伊總統莫布杜、及其他國際力量曾企圖促成此三派系的合作，但由於彼此猜忌，而終告失敗。^⑩基本上，雖然這些反殖民統治的運動給里斯本帶來極大的壓力，但由於其力量分散而無法迫使殖民政府就範，因此最後促成安哥拉獨立的並非武裝革命的成功，而是葡萄牙本身政情發生變化。^⑪

（一）沙拉薩的新國家及殖民統治

葡萄牙遲遲不肯放棄對安哥拉殖民統治，除了因這是一個它與過去帝國光榮史連結的最後象徵，另外的原因則是葡國本身的威權專制政治體系，讓國內反對殖民統治的力量，無法整合形成壓力。葡萄牙的威權政治體制是在一九二〇年代形成的，其起源是一九二六年的軍事政變，而此軍事政變則是保守勢力對一九一〇年推翻君主體制的共和主義份子的一個反擊。在軍事政變後，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的財政困難問題，軍方在一九二八年延請右翼學者沙拉薩（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入閣為財政部長，整頓財政。沙拉薩成功地平衡預算，獲得包括地主、企業家、天主教會及軍方等更廣泛保守勢力的支持。^⑫沙拉薩之後在一九三二年出任總理，並在次年仿倣義大利建立了法西斯式的「新國家」（Estado Novo），前後統治葡萄牙長達四十年，直到一九六八年因健康不佳辭去職位為止。

沙拉薩對殖民地的態度，是較前更為直接的中央集權統治，也就是說里斯本並沒有給予安哥拉省長自治的權力。由於葡萄牙認為安哥拉已成爲葡萄牙帝國屬地的一部份，而非殖民地，因此並沒有所謂的脫離殖民統治或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問題。爲了強化里斯本抗拒此風潮的決心，葡萄牙甚至將安哥拉劃爲海外的一省，和國內的各省遙遙相對。^⑬

在一九六一年的暴動發生後，爲了籠絡人心，沙拉薩積極引進外資，協助安哥拉的經濟發展，並鼓勵新的移民由葡萄牙移入安哥拉。儘管沙拉薩不願放棄安哥拉，但反殖民統治的力量逐漸在里斯本集結，國際社會亦開始對葡萄牙施壓，只是沙拉薩不爲所動。一九六八年沙拉薩的繼承者卡艾丹諾（Marcello Caetano）仍然持續原有的殖民政策，強力維護其在安哥拉的主權。卡艾丹諾認識到安哥拉對葡萄牙在政治及經濟上的重要性，若是失去安哥拉，其政權亦難以維持，因此始終不肯讓步。^⑭卡艾丹諾強調：「葡萄牙並不是一種定量有形的東西，或者是一個空間或一片土地；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某種人民，某種特定形式的國族聯合，一個不能分割而變爲烏有的祖

註⑩ Ingham, *Politics in Modern Africa*, p. 18; 張麟徵, 「安哥拉內戰何時了?」, 頁 69。

註⑪ 金神保, 「葡屬安哥拉的民族主義運動」, 頁 64。

註⑫ W. G. Clarence-Smith, "Capital Formation and Class Formation in Angola," in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Vol. II, edited by David Birmingham and Phyllis M. Marti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p. 187.

註⑬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 13.

註⑭ *Ibid.*

國。」^⑤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葡萄牙政治不穩定及經濟混亂的情況日趨嚴重。葡國軍隊在長期與殖民地的革命武裝力量對抗後，士氣低落，甚至還有士兵逃逸的情形。經濟方面，通貨膨脹及上百萬的失業者必須移往海外尋求工作，更加深了「新國家」體制的危機。在反政府的恐怖主義及破壞出現後，一九七四年軍事政變的發生，並不算是意外。^⑥

(二) 一九七四年的軍事政變

葡萄牙一九七四年的軍事政變，不單結束了沙拉薩所建立獨裁統治的「新國家」，更帶來了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Third Wave of Democracy)。同時它也打破了「葡萄牙語裔」的迷思，^⑦讓葡萄牙必須真實地面對過時的殖民政策，開始著手進行該如何讓「海外各省」獲得獨立。^⑧

這個政變的發動者是大約都是陸軍上尉層級的青年軍官，他們在四月二十五日清晨發動政變，很快地就控制了里斯本。基本上這是一個非流血政變，卡艾丹諾政府並沒有作頑強的抵抗，而選擇與叛變的軍官協商，並決定流亡。這個由年輕上尉軍官們所組成的武裝部隊運動(Movement of the Armed Forces, 簡稱 MAF)自知缺乏聲望，乃推舉史賓諾拉將軍(General Antonio de Spínola)為執政團的領導人。史賓諾拉不單是在民間受到高度的支持，也在軍中有相當的威信，更重要的是在政變前他因出版了一本批判葡萄牙殖民政策的書，而被前政府將他從副參謀總長的職位拉下，正好成爲一個與前政府劃清界線的代表性政治人物。

史賓諾拉曾是葡萄牙在幾內亞比索的軍事統領，在他所寫的「葡萄牙及其未來」一書中，明確地指出在和安哥拉武裝力量對抗中，唯有用政治的手段才能解決衝突，一個單純的軍事勝利已無可能。^⑨他還建議葡萄牙放棄海外各省，允許其完全自治，並與葡萄牙合組聯邦。^⑩基本上，史賓諾拉對安哥拉的前途有他自己的主張，而這樣的溫和看法也是與大多數葡萄牙的民衆之定見有高度的交集。

史賓諾拉隨後成爲總統，但他沒有完全掌握大權，並且受制於 MAF 中較爲偏激左傾的勢力，而這些左傾的勢力在安哥拉的爭議方面是主張讓這個海外省完全獨立。^⑪雖然史賓諾拉被迫放棄了聯邦的構想，預備給予殖民地完全獨立，不過他視

註⑤ 楊逢泰，「葡屬非洲往何處去」，頁 66~67。

註⑥ Marcum, "Lessons of Angola," p. 408.

註⑦ Charles K. Ebinger,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l War: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Orbis*, Vol. 20, No. 3 (Fall 1976), p. 669.

註⑧ Anthony G. Pazzanita,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ss in Angol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9, No. 1 (1991), p. 84.

註⑨ António de Spínola, *Portugal and the Futur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Perskor Publishers, 1974), p. 20.

註⑩ 張麟微，「安哥拉戰亂何時了？」，頁 70。

註⑪ 有關史賓諾拉和 MAF 間的角力，參見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p. 86~88.

MPLA 為莫斯科所支持的對象而不願與其談判。^{⑤②}這個排除 MPLA 的作法，當然會導致左傾 MAF 的不滿，終於導致史賓諾拉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下台。新的政府上台後，立刻將 MPLA 納入去殖民化的規畫中。

(三) 由阿爾浮協議到正式獨立

新政府首先和 MPLA、FNLA、和 UNITA 在十月達成停火協定，雖然此三股武裝力量之間存在著各樣的矛盾及實際的衝突，但卻極為務實地同意彼此承認對方的合法性，也願意和葡萄牙共同建立一個過渡政府。各方就在次年一月簽署了一個包括此三個組織在內的阿爾浮協議（Alvor Agreement），確定安哥拉完全獨立的各樣相關問題。^{⑤③}

根據這個在葡萄牙的阿爾浮市所達成的協議，過渡政府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起成立運作，並確定在下半年選出新的政府，而此新政府則預定在十一月十一日正式由葡萄牙手中接下政權，完成獨立。過渡政府是由三個派系的領導人組成一個三人的總統團，此外尚有內閣及一個國防委員會，其中的職位由三方及葡萄牙均分。過渡政府的外交事務仍然由里斯本主導，但統管國防及國內安全的國防委員會則是由葡萄牙的軍隊、警察、及三個武裝力量共同負責。

這樣的安排應該是很合理的，可惜的是 MPLA 的奈托（Agostinho Neto）及 UNITA 的薩文比這兩個領導人並未加入總統團。此外，由於在過渡政府成立前擔任安哥拉行政長官的庫廷和（Rosa Cutinho）在其短短半年任內採取了偏袒 MPLA 的政策，及近乎無政府狀態的統治，使得 MPLA 不單可以持續獲得來自蘇聯的武器，趁機坐大，也讓它的正當性日益增加。葡萄牙原先在過渡政府期間應扮演的角色是一個中立調解者，以確保政權的和平轉移，但實際的結果卻是偏袒不公。^{⑤④}

繼任的卡多索（Silva Cardoso）雖然有心整頓，但卻已無能為力，無怪乎臨時政府成立後，無法掌握安哥拉的情勢，各個派系間的武裝衝突也逐漸增強。這段期間，葡萄牙外長公開表示要考慮是否要採取軍事干預以平息這些衝突。一九七五年六月，里斯本甚至預備要請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卡多索在面臨逐漸混亂的局面，亦只能宣稱根據阿爾浮協議所規範行政長官不得干涉內政為由，避免介入。MFA 一度考慮要增派軍隊至安哥拉，但因軍方不願再回到非洲，幾乎要鬧兵變，而不得不放棄此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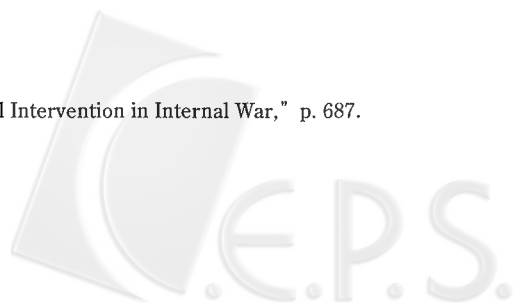
葡萄牙完全無心繼續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扮演正面主導的角色，而是在混亂中倉促撤退。由於里斯本的不負責任態度及缺乏實際的協調作為，包括殖民地的移民及軍隊的大規模返回歐洲，其結果當然是了權力真空的形成，^{⑤⑤}也讓原本就在支持各派系的外國勢力得以更積極地介入安哥拉的內戰。阿爾浮協議並沒有讓安哥拉的過渡政府

註⑤② *Ibid.*, pp. 92~93.

註⑤③ 張麟徵，「安哥拉戰亂何時了？」，頁 70；Ebinger,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l War," p. 687.

註⑤④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 95.

註⑤⑤ *Ibid.*, p. 96.



順利地透過選舉完成政權移轉，而是允許葡萄牙在十一月十一日時，以政權轉給安哥拉人民為說詞，全面撤出安哥拉。

在安哥拉獨立前半年的動亂中，由於 MPLA 鞏固了它在首都魯安達的地盤，將 FNLA 及 UNITA 完全趕出，得以完全掌控過渡政府，因此在內戰中佔了地利之便，並在獨立後順理成章地成為魯安達政府的實際代表。^⑤不過，由於在獨立前蘇聯及古巴就已開始支持 MPLA，使得在冷戰中與蘇聯敵對的美國因擔憂國際共產主義滲透非洲，而選擇支持 FNLA 及 UNITA 與其對抗。中共原本希望內戰三方能夠團結一致對抗殖民政權，因此不願支持任何一方，後因蘇聯所支持的 MPLA 日益坐大而也開始支持另外兩個派系。南非亦擔心古巴的介入，會影響到其統治的殖民地納米比亞，讓當地的西南非人民組織（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 SWAPO）有了避難所後，更容易展開對白人殖民政府的游擊戰，因而選擇支持 UNITA 對抗 MPLA。此外，安哥拉的鄰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薩伊、及尚比亞亦被捲入，以下就是我們對這些國際勢力的討論與分析。

伍、國際勢力的介入

安哥拉的內戰源自於獨立前就存在著不同派系的無法整合，而這些派系的背後亦各有支持的外國勢力。這些國際力量並沒有因為安哥拉的獨立而消失，它們是八〇年代內戰持續的主要因素，但也同時是促成和平協議的推手，其影響力在九〇年代後才逐漸式微。此外，聯合國的查核團及維和部隊則是在達成和議後的監督停火及解除武裝等工作方面，扮演了極為重要的中立角色。

由於國際勢力是在不同時期、不同情境、及不同場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要將各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角色分別作詳盡的敘述，有可能會造成內戰發展及和議分析方面的重覆及困擾。基於這項考慮，以下僅作簡略的重點介紹，其餘相關較為詳盡的角色扮演，則是穿插在後續的討論中。

安哥拉自一九七五年由葡萄牙獨立後，就一直處於內戰的狀態。在冷戰期間，蘇聯支持執政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美國則是力挺反對的游擊勢力—安哥拉獨立全國聯盟，後者另外也獲得中共的支持。美蘇雙方將安哥拉的內戰視為全球東西對抗的一部份，但雙方並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而是提供各項援助、透過盟邦進行所謂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美國的代理人是南非，蘇聯的代理人則是古巴。

一、美國

除了賴比瑞亞外，美國和非洲的國家並沒有任何的歷史淵源。^⑥由於沒有傳統的包袱，美國過去在非洲的經營並不積極。^⑦在漠南的其他非洲國家中，美國在部份國

註⑤ Martin, "Peace in Angola?" p. 230.

註⑥ 有關美國和賴比瑞亞的淵源，參見嚴震生，「賴比瑞亞的內戰、區域衝突、及國際介入」，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4期（民國92年7、8月），頁75~103。

註⑦ 林碧炤，「論列強角逐與非洲區域和平」，問題與研究，第18卷第5期（民國67年2月），頁62。

家如南非、薩伊、尚比亞、及奈及利亞等有相當大的跨國企業投資，但在安哥拉方面，至少在其一九七五年獨立之前，政治或經濟的淵源或關係是比較有限的。^⑧在非洲獨立運動方興未艾的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也就是安哥拉動亂開始時，甘乃迪總統選擇對沙拉薩施壓，不但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所通過譴責葡萄牙的決議案，並對UPA/FNLA的羅伯托提供金援，認為他將是未來最適合擔任安哥拉獨立後的新領導人。^⑨

在葡萄牙發生軍事政變後、安哥拉走向獨立前的一九七五年初，安哥拉境內的三個武裝勢力已開始相互攻擊，美國仍是力挺FNLA。由於蘇聯及古巴強力支持具有馬克斯主義色彩的MPLA，因此當MPLA在內戰中佔優勢並於獨立後取得政權時，美國拒絕給予外交承認。在FNLA逐漸式微時，美國轉而支持UNITA對抗MPLA。在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的認知中，「美國會以軍事迎擊蘇聯在世界任何偏遠角落的動作」。^⑩

不過，越南的赤化讓美國國會中對海外的顛覆行動有所保留。在安哥拉方面，為了防止美國更深地陷入其內戰中，國會於一九七六年通過了克拉克（Dick Clark）參議員所提出的克拉克修正案（Clark Amendment），禁止美國對安哥拉交戰的各方提供任何軍事援助。^⑪表面上看來，美國無法直接支持UNITA，但在實際操作方面，福特總統是透過代理人的南非介入安哥拉的內戰。在克拉克修正案於一九八五年被廢止之前，這是美國操作的模式。

二、蘇聯

蘇聯也與美國一樣，和非洲各國並沒有如同英、法等國的歷史淵源。在冷戰期間，莫斯科當然也企圖在非洲建立其軍事據點。由於英、法前殖民地大都與其母國維持了相當程度的政治、經濟及軍事之關係，再加上這兩個西歐國家仍有一定的實力，因此莫斯科較有希望進入的戰略要地，就是局勢較為混亂的非洲之角及葡屬非洲。前者以索馬利亞的海軍基地為代表，後者則包括了安哥拉及莫三比克的深水港口。而取得這些海港使用權的前提，就是與控制這些港口的政府維持良好的關係。蘇聯大力支持MPLA，除了有意識形態的原因外，^⑫當然就和它控制安哥拉的大西洋沿岸的許多港口有關。

在一九七五年安哥拉獨立後，蘇聯對MPLA提供的軍事物資包括了裝甲車、飛彈、火箭發射器、反坦克大砲、重機槍等重型裝備。^⑬不過，蘇聯並沒有派遣軍隊介

註⑧ Marcum, "Lessons of Angola," p. 407; Chas. W. Freeman, Jr.,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3 (Summer 1989), p. 126.

註⑨ Wright, *The Destruction of a Nation*, pp. 33~41.

註⑩ John Stockwell, *In Search of Enemies: A CIA 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 67.

註⑪ "House Approves Cutoff of Aid to Angola, Defense Bill Cleare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anuary 31, 1976), p. 208.

註⑫ Keith Somerville, "The U.S.S.R. and Southern African Since 1976,"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2, No. 1 (March 1984), p. 74.

註⑬ 紀清寅，「美俄『和解』的演變與安哥拉事件之考驗」，*問題與研究*，第15卷第6期（民國65年3月），頁48~49。

入，而是透過其代理人的古巴，不斷派運大量兵員參戰，使得美國、中共及南非所支持的反對 MPLA 力量無法獲得軍事勝利，讓西南非洲這個親莫斯科的政府得以不致動搖。

三、中共

中共在安哥拉的內戰中，並沒有太多的介入，它之所以引起重視，乃是因為北京在各派系中，選擇支持的是 FNLA 及 UNITA 一兩個較為親西方的武裝力量，而非奉馬克斯主義為圭臬、受到蘇聯及古巴大力支持的 MPLA。^⑥雖然如前所述，薩文比的意識形態似乎較為接近毛澤東的農村革命理論，但中共早期是支持羅伯托領導下的 FNLA。^⑦在 FNLA 式微後，北京才轉向 UNITA。

表面上看起來，中共的立場與其傳統上對第三世界的武裝革命之態度似乎有所出入，特別是與美國共同支持 UNITA 更是讓人難以費解。實際上而言，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共早已和蘇共有了間隙，而美國自尼克森擔任總統後，也積極尋求改善兩國關係，因此 UNITA 同時獲得此兩個意識形態迥異的東西霸權之力挺，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當一九七八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訪問北京時，還會要求中共提供 UNITA 六百噸的武器，而這些武器也的確於次年送抵 UNITA 手中。^⑧不過，中共對 UNITA 支持的象徵意義超過實質利益，而後者獲得來自南非方面的各種援助，則是實惠的多。

四、南非

南非的白人政府在安哥拉獨立前，就因擔憂該國境內武裝勢力若是革命成功，會對該國的白人政權之穩定造成衝擊。因此南非政府對安哥拉、辛巴威及莫三比克等所謂「前線國家」（frontline states）的少數殖民統治給予支持，希望藉此讓南非和漠南非洲的黑人國家間有一個緩衝區。基於此考量，南非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就對葡萄牙在魯安達的殖民政府提供了情報及軍事作戰物資的援助。^⑨

在安哥拉獨立後，導致南非捲入其內戰的主要原因，就是納米比亞的獨立問題。納米比亞曾是德國殖民地，在一次大戰後，此原稱為西南非洲（South West Africa）的領土由南非接管，成為南非的託管統治地。由於南非遲遲未準備讓此託管地獨立，一個爭取獨立的武裝抗爭運動—西南非人民組織遂應運而生。^⑩南非當然不希望安哥拉的獨立會對納米比亞產生骨牌效應，而 SWAPO 在 MPLA 掌權後，就開始以安哥拉

註⑥ 有關中共的角色，請參閱張麟徵，「安哥拉戰亂何時了？」，頁 71；楊逢泰，「安哥拉戰亂面面觀」，頁 47。

註⑦ Somerville, "The U.S.S.R. and Southern African Since 1976," p. 75.

註⑧ Fred Bridgland, *Jonas Savimbi: A Key to Afric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6), pp. 273~275.

註⑨ Marcum, "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rn Africa: Angola," pp. 3~4

註⑩ 有關納米比亞的獨立問題，請參閱楊逢泰，「西南非獨立問題」，頁 83~92；楊逢泰，「納米比亞：一個『難解的結』」，頁 91~102。

南部為掩護其藏身的基地。此外，MPLA 毫不掩飾地支持想要推翻少數白人統治的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 ANC），也使得南非必須真實地面對一個與其敵對的新政府，而積極介入安哥拉。

五、古巴

古巴自一九五九年卡斯楚（Fidel Castro）革命成功、建立了西半球的第一個共產政權後，就熱衷於革命經驗的輸出。除了附近的中南美洲外，古巴也積極支持非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或共產份子活動，而負責這個地區的協調及執行者，正是赫赫有名的蓋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⑩在蓋瓦拉的策劃下，古巴在一九六五年開始提供 MPLA 軍事支援，並在一九七五年獨立後出兵協助訓練已獲得蘇聯裝備的 MPLA 軍隊。為了對抗接受南非軍援的 UNITA，古巴本身的軍隊也投入了安哥拉的內戰，在最多時有高達五萬名的古巴軍人在安哥拉境內，^⑪規模相當可觀，是 MPLA 政府始終未被薩文比推翻的主要原因。

六、薩伊／剛果民主共和國

在前面的討論中，曾提及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NLA）的前身是在一九五四年於比屬剛果首都所成立的北安哥拉人民聯盟（UNPA）。由於 FNLA 支持群眾基礎的巴剛果人亦是比屬剛果的重要族群，因而有特別的感情，也使得這個後來獨立後稱為剛果／薩伊的鄰國，無法脫離被捲入安哥拉內戰的命運。薩伊總統莫布杜在隨後的內戰中較為偏袒 UNITA 的立場，雖然可以獲得薩文比的信任，有機會擔任調停人，但最終也因這個立場而促使安哥拉的 MPLA 選擇在薩伊的內戰中支持叛軍領導人卡畢拉，間接導致其政權的垮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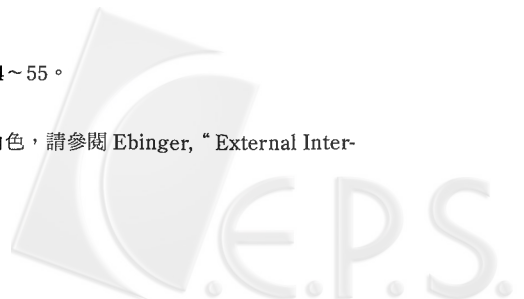
七、剛果共和國

首都位於布拉薩維爾的剛果共和國在 MPLA 展開武裝抗爭的初期，就讓這個革命團體將其總部遷往布拉薩維爾。^⑫不過，一個極為保守的剛果政府會對激進的 MPLA 表達如此善意，當然是有其特別的目的，就是以此交換 MPLA 反對卡賓達的獨立或是成為剛果（薩伊）的一部份。無論如何，MPLA 若是沒有這個掩護所，就無法在後續爭取獨立的武裝行動中，取得有利的戰略位置。此外，剛果也在安哥拉的和平協議方面有所貢獻，一九八八年完成的納米比亞獨立及南非與古巴的撤軍，就是在布拉薩維爾的會議中所承諾簽署的。

註⑩ 劉天均，「古巴介入安哥拉內戰及其對非洲南部之影響」，頁 54～55。

註⑪ Freeman,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p. 136.

註⑫ 有關剛果共和國在安哥拉獨立之前對 MPLA 的支持及所扮演的角色，請參閱 Ebinger,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l War,” pp. 677～682.



八、尚比亞

鄰國尚比亞在安哥拉未獨立時，與該國境內的三個派系都維持良好關係，也有意整合此三派勢力對抗葡萄牙的殖民政府。^⑳尚比亞捲入安哥拉的內戰，除了是因為UNITA在安哥拉的游擊活動範圍基本上與尚比亞接壤，也和尚比亞巴洛澤省（Barotse）的經濟發展落後有關。薩文比在UNITA成立初期，曾經獲得尚比亞的支持，但是由於他介入巴洛澤省的政治，並且炸斷尚比亞這個內陸國通往安哥拉西岸海港洛畢多（Lobito）的班桂拉（Benguela）鐵路，而被驅逐出境。自此後，基本上尚比亞與MPLA政府維持了相當不錯的關係，同心對抗想要在尚比亞境內鼓動分離主義的聲浪。

九、葡萄牙

葡萄牙身為安哥拉的前殖民宗主國，照理來說，應該可以在該國獨立後的內戰中，扮演積極斡旋的角色。不過，由於在獨立前葡萄牙是倉促撤出，並沒有對獨立後的政治機制作妥善的安排，因此可以說是完全失去了威信。或許正因為有此遺憾，才使得里斯本幾乎是帶著贖罪的心情於九〇年代初期願意積極參與調停，終於促成了白塞斯和議。由於葡萄牙畢竟已不是政治或經濟大國，因此它對前殖民地安哥拉的影響力，也遠不如法國在法語非洲國家發生衝突或內戰時，所扮演更為吃重的角色。

十、聯合國

聯合國在安哥拉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一）扮演通過相關決議的角色、（二）促成停火協定及和議、（三）協助監督停火及解除武裝、（四）提供人道救援。在早期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一五一四號決議案是重申民族自決的權利，而一五四二號決議案則是將安哥拉定義為非自治領土（non self-governing territory）。一九六一年四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六〇三號決議案，要求葡萄牙依前兩個決議案在安哥拉推動改革。安理會也在同年六月通過一六三號決議案，譴責葡萄牙對安哥拉動亂的暴力鎮壓。一九六一年年底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一六九九號決議案則是對葡萄牙未能遵守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有關非自治領土的規定，而給予譴責。^㉑此外，聯合國安理會在一九七八年通過有關納米比亞獨立問題的四三五號決議案，也和安哥拉內戰的結束習習相關。九〇年代安理會所通過和安哥拉相關的決議案則包括一九九一年的六九六號決議案、一九九三年的八六四號決議案、一九九八年的一一七三號決議案、一九九九年的一二二九號、一二三七號及一二六八號決議案。這些決議案不是將安哥拉和平協議失敗歸諸於UNITA，就是要求對其實施禁運，讓它在國際間益形孤立。

在促成停火協定及和議方面，雖然一九八八年的納米比亞/安哥拉和議是美國和

註^㉑ 張麟徵，「安哥拉戰亂何時了？」，頁71。

註^㉒ Guimaraes,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p. 95.

蘇聯奔走促成的，但聯合國不單是這項和議的見證者，也因願意派遣維和部隊監督古巴軍隊從安哥拉的撤出，讓此和議有可能成功。一九九一年的白塞斯和議，雖然並非有聯合國所主導，但其達成的協議包括了由聯合國維和部隊扮演監督停火及解除武裝的重要角色。一九九四年的盧沙卡和議則是完全由聯合國秘書長的特使所主導促成者。儘管聯合國在此三次和議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盡相同，但它的參與卻是促成和議不可缺的要素。

在監督停火及解除武裝方面，聯合國在一九八八、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五年前後派遣了三梯次的維和部隊—聯合國安哥拉查核團（United Nations Angolan Verification Mission，簡稱 UNAVEM），並於一九九七年再派聯合國安哥拉觀察團（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Angola, MONUA）參與監督停火及解除武裝的工作。至於人道救援方面，聯合國自一九九三年起就成立了聯合國人道援助協調小組（U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oordination Unit, UHAC），來協助安哥拉的人道救援工作。在安哥拉步入新的和議之今日，徹底完成武裝的解除及UNITA人員重返社會的各項安排，仍需聯合國這些組織的積極參與，方能奏效。此外，聯合國特別代表為一九九二年的總統選舉背書，使得選舉的公正性不被質疑，也強化了安哥拉政府的合法性。^⑥

陸、各項和平協議

在安哥拉內戰期間，除了美國、蘇聯、南非、古巴、及中共等國際勢力的介入外，葡萄牙這個原殖民國和聯合國也曾在促成和平協議的努力方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反倒是非洲團結組織沒有積極的參與。^⑦冷戰末期，美蘇間的意識形態對抗告逐漸淡化，戈巴契夫上台後就開始尋求降低國外的軍事承諾，並與美國合作共同解決第三世界的問題。同時，代理人的戰爭兵困師疲，華盛頓及莫斯科也極力想要擺脫沉重的負擔。因此，在強國無意再行介入的情況下，安哥拉、南非及古巴在一九八八年簽署了一項三邊協議，另外安哥拉也和古巴在同時簽署了一項雙邊協議，這兩項協議促成了南非和古巴由安哥拉撤軍，及南非的託管地納米比亞的獨立。

一、納米比亞的獨立與古巴撤軍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美蘇間的冷戰關係已逐漸緩和，同時雙方也有意終結非洲的代理人戰爭，使得安哥拉的內戰在強權無力繼續支持的情況下，獲得了和平解決的契機。不過，邁向和平的第一步，竟然不是安哥拉境內的和平協議，而是周邊的納米比亞，及外國勢力的古巴和南非。

納米比亞的捲入安哥拉內戰，以如先前所述。根據一九七八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四三五號決議案，納米比亞應在國際監督下舉行民主選舉，完成獨立。佔領納米比亞的南非並非完全排斥聯合國的這項決議案，但長期駐紮於安哥拉的古巴軍隊，卻被

註⑥ Marcum, "Angola: War Again?" p. 221.

註⑦ 這或許和該組織成員意見分歧有關，請參閱楊逢泰，「安哥拉戰亂面面觀」，頁 45~46。

視爲是執行這項決議的障礙。雷根政府爲了對抗蘇聯及古巴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自一九八五年廢除了克拉克法案後，就重新開始提供對 UNITA 的軍事及經濟援助。這乃是因爲美國政府認爲一個強化的 UNITA，是可以在防堵安哥拉政府或古巴軍隊企圖採用軍事解決途徑時，扮演較爲積極正面的角色。^⑦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美國與蘇聯進入了新的和解階段，兩國就結束安哥拉內戰及完成納米比亞的獨立問題，達成原則上的協議，並由美國國務院主管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柯洛克（Chester A. Crocker）擔任調停人，邀請安哥拉、古巴及南非的代表，自一九八八年五月自十二月間在倫敦、紐約、日內瓦、及布拉薩維爾等地展開一連串的四國會談。蘇聯代表並未正式與會，乃是以諮商者的身份在幕後提供建議及協助。^⑧

四國會談先是在紐約會談中，確立了主要的議題，並在日內瓦會談完成了有關停火及信心建立措施的協定。在布拉薩維爾的幾次會談後，安哥拉、古巴、及南非達成所謂的布拉薩維爾議定書（Brazzaville Protocol），承諾簽署一項所謂的「三國協議」（Tripartite Agreement）及「古巴—安哥拉雙邊協定」（Cuba-Angola Bilateral Agreement），完成納米比亞獨立及南非與古巴的撤軍。^⑨爲了確定古巴自安哥拉撤軍能依協定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成立「聯合國安哥拉查核團」。柯洛克長期主張將安哥拉的國際勢力撤軍與納米比亞獨立結合的「連結概念」（linkage concept），^⑩終於獲得具體的實現。

二、戈巴敦奈和議（一九八九年）

在外國勢力逐漸退出安哥拉之際，幾個非洲鄰近國家極力促成該國內戰的停火。一九八九年五月，安哥拉總統杜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和剛果共和國、加彭、莫三比克、聖多美普林西比、薩伊、尚比亞、及辛巴威等國領導人在魯安達會面，企圖尋求他們支持他在一月間所提出的和平建議。這項和平協議包括將尚比亞經安哥拉南部到大西洋的班桂拉鐵路沿線一帶劃分爲和平區、結束外國的介入、停止對 UNITA 的支持、及政府實施特赦等。^⑪不過，這些提議內容並沒有對 UNITA 作太多的讓步，也不包括 UNITA 所提的政權分享及多黨民主選舉或聯合政府，反倒是要求薩文比必須流亡海外，UNITA 的部隊則是併入政府軍中，文人亦然，以建立一個一黨獨大的 MPLA 政府。

註⑦ Lin,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Looking to the Future," p. 113.

註⑧ 劉天均，「古巴介入安哥拉內戰及其對非洲南部之影響」，頁 59；劉天均，「古巴自安哥拉撤軍與那米比亞獨立—兼論西南非區域安全問題」，頁 47；Freeman,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p. 135；Mark Webber, "Soviet Policy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Final Phas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0, No. 1 (March 1992), pp. 5~6.

註⑨ 有關此兩項協議的內容，請參閱 Pazzanita,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ss in Angola," p. 111；劉天均，「古巴自安哥拉撤軍與那米比亞獨立—兼論西南非區域安全問題」，頁 48~49。

註⑩ Freeman, Jr.,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pp. 128, 135.

註⑪ Donald Rothchild and Caroline Hartzell, "Great- and Medium-Power Mediations: Angola," *The Annals: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18 (November 1991), p. 47.

此會議中同時決定由薩伊總統莫布杜作為 MPLA 和 UNITA 的主要調停人。莫布杜隨即於六月在薩伊的戈巴敦奈（Gbadonite）舉行和平會談，在兩天內就促使雙方握手同意停火協議。為了要讓杜桑托斯及薩文比能夠達成和議，莫布杜邀請了近二十個非洲國家的元首參與，希望藉此施加壓力。

雖然杜桑托斯及薩文比此次會議中有一次歷史性的握手，但 MPLA 和 UNITA 並未真正協商，而是由莫布杜單獨與一方會談，再於中間穿梭斡旋。^②這個斡旋協調的結果是三個基本的原則：（一）雙方願意放下武器達成和解；（二）雙方願意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前達成停火；（三）透過莫布杜總統的協調，成立國家和解委員。

這樣的一個相當抽象的協議原則，當然是容易造成誤解。杜桑托斯認為薩文比會接受政治流亡的安排，讓 UNITA 接受整合，納入政府的體制，但薩文比則是自認他和 UNITA 密不可分，因此只願接受多黨政治的安排，及讓 UNITA 和 MPLA 有一個公平競爭的自由選舉機會。雙方原來並沒有太多的交集，也不願意談判，但礙於非洲國際社會的壓力，而勉為其難赴會，隨後又反悔，乃是可以預期的。由於薩文比表示無法接受協議，而使戈巴敦奈和議（Gbadonite Accord）成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拘束作用。

儘管莫布杜在戈巴敦奈和議後又召開一連串的后續會議，包括在薩伊首都金夏沙及辛巴威首都哈拉瑞的高峰會議，但這些會議最終仍是無法讓 MPLA 及 UNITA 對戈巴敦奈和議有所共識。^③因此，到了一九九〇年春，戈巴敦奈和議可以算是陷入困境，沒有任何的進展，前殖民母國葡萄牙適時介入，讓和平談判得以繼續進行。除了葡萄牙外，美國與蘇聯堅持和平談判的強烈立場，也是促成新和議達成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安哥拉的 MPLA 政府有戈巴敦奈的經驗中，認識到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任何協議都不能排除薩文比，更不能以迫使他作政治流亡為最終目標。

三、白塞斯和議（一九九一年）

根據威廉斯教授的觀察，葡萄牙願意擔任調停者有以下的幾個原因：（一）自一九七五年葡萄牙撤離安哥拉後，其對安哥拉過渡至獨立期間不負責任的態度及作法就遭受到嚴厲的批評，因此它自覺有必要作內戰的調停人，希望能獲得後世歷史學者較為寬容的對待；（二）安哥拉政府與 UNITA 均認為葡萄牙的立場是比較中立的，因此是交戰雙方可以共同接受的調停人；（三）不單 MPLA 及 UNITA 接受葡萄牙的調停角色，超級強國的美國及蘇聯亦是全力相挺，大大提高了調停成功的機會；（四）若是調停成功，就可證明葡萄牙在南部非洲仍有影響力，而可以達到提升其國際地位，

註^② Donald Rothchild and Caroline Hartzell, "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Negotiations in Angola," in I. William Zartman, ed., *Elusive Peace: Negotiating an End to Civil War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Chapter 8.

註^③ 劉天均，「古巴自安哥拉撤軍與那米比亞獨立—兼論西南非區域安全問題」，頁 54。

特別是在歐盟中地位的加分作用。^④

基於以上的考量及有利因素，葡萄牙外長與 MPLA 及 UNITA 的代表自一九九〇年四月下旬起，在葡萄牙的艾佛拉（Evora）展開了一共是六個回合的談判協商。雖然葡萄牙積極促成和解，但交戰雙方的歧見已深，彼此互不信任，此外由於 UNITA 要求在簽署停火協議前，獲得 MPLA 政府的正式承認，而 MPLA 則是認為必須先有停火協議才能進行後續的談判，雙方僵持不下，也使談判協商難有進展。里斯本認識到本身經濟及軍事力量仍不夠雄厚，無法對 MPLA 或 UNITA 造成強大的壓力，來促成和議，遂決定邀請美、蘇兩國在第四回合開始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協商談判。

此外，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和蘇聯外長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分別與安哥拉的外長及 UNITA 的外長公開會晤，表示對安哥拉和平進程的關切與支持，並且將安哥拉政府、UNITA 及葡萄牙的代表於十二月集結在華府開會，完成了一個以葡萄牙主導調停談判的概念架構，就是所謂的華盛頓概念文件（Washington Concept Paper）。^⑤

根據這份文件的所達成的決議，未來和平進程包括了：（一）戰後安哥拉建立多黨民主政治；（二）由聯合國主導的國際停火監督機制；（三）國際選舉監督；（四）將選舉時間和停火時間掛勾；（五）在停火協定達成後，停止來自外國的致命武器之援助；及（六）在停火協定達成後、大選前，成立一個國家的軍隊。^⑥次年一月，美、蘇、葡三國以此文件為基礎，完成了三部份的和平計畫，包括一份政治原則的相關文件、一份停火架構的協議書、及一個處理未來談判的機制設計。不過，在二月份的第六回合談判中，MPLA 仍是堅持要先達成停火，才願意簽署和平協議，而 UNITA 代表則宣稱其無權接受此條件，使葡萄牙不得不中斷此回合的談判。

由於美國、俄羅斯及葡萄牙為此和平協議已注入相當程度的精力，當然不願見到其努力功敗垂成，因此展開一連串的外交動作，終於迫使 MPLA 在停火議題上願意展現彈性，而 UNITA 也表示不堅持選舉必須在一年內舉行的要求。在雙方各作一些讓步後，MPLA 和 UNITA 的代表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於葡萄牙的小鎮艾斯托里爾（Estoril）簽署停火協議。五月三十一日，杜桑托斯及薩文比正式簽署了新的和平協議，就是所謂的白塞斯和議（Bicesse Accord）。^⑦白塞斯和議的重點包括（一）多黨政治體制、（二）雙方軍隊的解除武裝、（三）新國家軍隊的成立、（四）在國際監督下於一九九二年九月舉行自由公平的選舉。同時，新成立的共同政治和軍事委員會（Joi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mmission）將負責監督整個過渡的過程。^⑧

註④ Abiodun Williams, "Negoti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in *Making War and Waging Peace: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edited by David R. Smock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p. 203.

註⑤ Rothchild and Hartzell, "Great- and Medium-Power Mediations: Angola," pp. 53~54.

註⑥ Wright, *The Destruction of a Nation*, p. 158.

註⑦ 此和議原先被稱為艾斯托里爾和議，但隨後則被稱為白塞斯和議。

註⑧ Inge Tvedten, "U.S. Policy Towards Angola Since 1975,"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0, No. 1 (March 1992), p. 50.

四、國會、總統選舉與戰火再起（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年）

根據白塞斯和議，安哥拉在一九九二年九月舉行國會與總統選舉。爲了迎接此安哥拉獨立以來的首次多黨民主選舉，魯安達政府在一月時召開了一個公開的預備會議，成立了國家選舉委員會；聯合國也在二月份任命安絲緹女士（Margaret Anstee）爲第二期的聯合國安哥拉查核團（United Nations Angola Verification Mission II，簡稱 UN-AVEM II）特別代表。

薩文比在先前之所以要求選舉要在停火後一年就可舉行，乃是因爲他相信若是延後將會有更多的政黨參與分割選票，同時執政的 MPLA 也可靠著執政的優勢，爲競選作更有利的佈署。此外，薩文比自認支持 UNITA 的歐維布恩杜族人口較 MPLA 支持基礎的金布恩杜族要多，因此認爲在國會和總統的選舉中，應有獲勝的機會。不過，在九月二十九及三十日的大選中，UNITA 在國會方面僅獲得了百分之三十四點一的選票，遠遠落後了 MPLA 的百分之五十三點七的選票，另外仍然存在的 FNLA 則是獲得了百分之二點四的選票。在兩百二十席的國會席次中，UNITA 贏得七十七席，MPLA 則是一百二十九席，而 FNLA 僅僅獲得五席，其餘的十四席分別由八個小黨瓜分。

在總統選舉方面，薩文比僅獲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MPLA 的杜桑托斯雖然獲勝，但得票率爲百分之四十九點五，並未過半，因此應進行第二輪的選舉。

在國際觀察家的眼中，這兩個同時舉行的選舉還算是一次自由及公正的選舉。由各選區投票結果來看，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 MPLA 及 UNITA 勢力的分佈（各自贏得其控制最久、支持群眾最穩固的四省），但在比較不屬於兩大勢力的其他省份中，UNITA 表現不佳，是其失利的主要原因。^⑧

當薩文比發現自己在一九九二年的總統選舉中失利後，也認識到在第二輪的選舉中幾乎不可能獲勝，因此立刻以選舉不公爲理由撕毀和平協議，回到叢林中重啓戰爭。雖然包括美國及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都一再呼籲薩文比誠實面對選舉結果，但他意已決，不願接受失敗的事實。由於薩文比在選舉前即有若輸了選舉就會在回到武裝抗爭的預備，因此 UNITA 並未完全解除武裝，使得他在十月底開戰後，很快就取得戰場上的優勢。在隨後的一年半中，內戰死亡的人數竟然高達十二萬人，超過白塞斯和議前十六年死亡人數總和的一半。^⑨最令人感到諷刺的發展，就是安哥拉政府爲了扭轉逆勢，竟然花錢僱用由南非退役軍人組成的外籍傭兵團——執行終結者（Executive Outcomes），協助對抗 UNITA。^⑩

註^⑧ Marcum, "Angola: War Again," p. 220; Anthony W. Pereira, "The Neglected Tragedy: The Return to War in Angola, 1992-3,"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2, No. 1 (March 1994), p. 22.

註^⑨ Vasu Gounden and Hussein Solomo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f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gola and South Africa," <<http://www.usc.edu/dept/LAS/ir/cis/cews/database/SouthAfrica/southafrica.pdf>>, p. 5.

註^⑩ Ian S. Spears, "Angola's Elusive Peace: The Collapse of the Lusaka Acco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6, No. 4 (Autumn 1999), p. 566.

在這一年半的期間，國際社會並未放棄安哥拉的和平希望。聯合國駐安哥拉的特別代表安絲緹女士自內戰再度爆發後，就極力促成新的停火及和平談判，包括了一九九三年一月在衣索匹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的談判及四月在象牙海岸阿必尚的議定書（Abidjan Protocol），但都因為薩文比所要求任何協議必須反映UNITA新的軍事斬獲遭到MPLA的拒絕，而無法達成和議。^⑳

五、盧沙卡議定書（一九九四—一九九八年）

薩文比不斷在和議談判中提出安哥拉政府不能接受的條件，當然是因為他對自己可以獲得軍事勝利深具信心有很大的關係。不過，美國對安哥拉的立場在一九九三年一月柯林頓成為新總統後，已有了顯著的改變。首先，美國在安哥拉獨立近二十年後，首次給予了其外交上承認，讓杜桑托斯政府安心，知道美國願意承認其政權的合法性。其次，柯林頓政府也以此作為向UNITA施壓的工具，希望薩文比能重回談判桌。^㉑聯合國也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通過了第八四三號決議案，譴責UNITA必須為阿比尚談判失敗負責。柯林頓政府甚至在九月二十三日宣佈第一二八六五號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提供或販賣任何武器給UNITA。這和聯合國先前在九月十五日所通過對安哥拉進行制裁的八六四號決議案是一致的。或許是因為薩文比認為國際輿論對其不利而想要改善形象，或許是因為薩文比想要鞏固軍事優勢、或許是因為薩文比認為美國與安哥拉政府改善關係後，將會對UNITA未來的發展有負面的影響，無論如何，薩文比突然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宣佈片面停火。^㉒此善意的表達，促成了隨後在尚比亞首都盧沙卡展開的談判。

這個由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安哥拉特使貝耶（Alioune Blondin Beye）所主導的談判，終於促成了內戰雙方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簽署盧沙卡議定書（Lusaka Protocol），確立了停火、軍隊整合、及和解的程序，並在UNITA解除武裝、統一的軍隊及警察、國家團結與和解政府（Government of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簡稱GURN）、及UNITA如何由武裝部隊轉換成政黨等重要議題方面，有明確的規定。聯合國也在一九九五年派遣第三期查核團—UNAVEM III，協助維持和平的工作。一九九七年，一個新的聯合國工作團取代了UNAVEM III，繼續監督盧沙卡議定書的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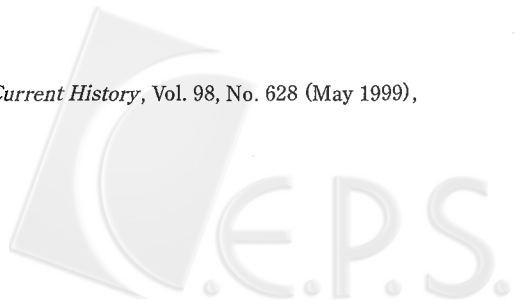
在盧沙卡議定書簽署後，UNITA的確開始解除武裝，也有一些資深的幹部加入政府，不過薩文比的立場倒是相當模糊，除了先前是由代表簽訂議定書外，也沒有在政府中有任何的角色，似乎又為自己預留可以反悔的空間。^㉓因此即使在一九九七年四月GURN正式成立、及七十名在一九九二年當選國會議員的UNITA成員重新入座後，UNITA仍然與政府軍發生衝突。安哥拉的MPLA政府為了斷絕薩文比的外援，也開

註^㉑ Wright, *The Destruction of a Nation*, pp. 172~176.

註^㉒ *Ibid.*, p. 176.

註^㉓ Carrie Manning, "The Collapse of Peace in Angola," *Current History*, Vol. 98, No. 628 (May 1999), p. 209.

註^㉔ *Ibid.*



始支持薩伊的叛軍卡畢拉，成功地推翻了莫布杜，並且主導剛果共和國總統里蘇巴（Pascal Lissouba）的下台，並對尚比亞施壓，要求徹底執行對 UNITA 的制裁。此外，杜桑托斯亦企圖分化 UNITA，用積極籠絡或恐嚇的方式製造 UNITA 成員和薩文比間的矛盾。^⑥

雖然內戰衝突並未因盧沙卡議定書而平息下來，但導致此和議最終無法執行的主要原因則是一九九八年六月聯合國特使貝耶在阿必尚因飛機失事而意外身亡。^⑦在此之後，安哥拉政府決定不再以和平方式解決內戰，而在一九九八年年底展開全面攻擊，也使得在執行方面跌跌撞撞的盧沙卡議定書因著戰端的重起，正式遭到撕毀。^⑧

六、後盧沙卡議定書的內戰衝突（一九九八—二〇〇二年）

由 UNITA 分裂出的革新 UNITA（UNITA-Renovada）在一九九八年底成爲南部非洲開發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正式承認的盧沙卡議定書執行夥伴，此發展使得薩文比益加孤立，也讓安哥拉政府有信心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宣佈他爲戰犯，並要求其軍隊和警察要繼續作戰，直到達成完全殲滅薩文比所領導的顛覆行動爲止。^⑨換句話說，安哥拉政府開始將 UNITA 和薩文比作一明顯的區隔，它要與前者進行和平談判，但對後者則是尋求軍事解決。

儘管 UNITA 遭到 MPLA 政府的分化，但薩文比卻因爲已預先藏好了武器，僅僅在解除武裝時繳交了過時無用的落後武器，因此當戰端再啓時，薩文比所領導的 UNITA 仍有足夠的火力與政府軍周旋。雖然 UNITA 長期支持者的美國已改善了它和安哥拉政府的關係，並譴責薩文比是內戰的禍首，但仍無法讓他再回到談判桌上。薩文比靠著走私控制地區的鑽石，而能突破國際外交上的孤立，維持其內戰的需要。

七、二〇〇二年的盧沙卡和議

在盧沙卡議定書執行失敗三年多後，薩文比於二〇〇二年二月遭到政府軍格殺，政府和群龍無首的叛軍展開新一回合的和平談判，使得安哥拉自獨立後就陷入長達二十七年的內戰有了終結的機會。由於薩文比在九〇年代的兩次協議皆是出爾反爾，特別是在外國勢力皆退出之後，仍一意孤行，而被視爲是安哥拉達成和平的障礙，因此這次協議是否在主要阻力薩文比消失後而終能成功，就特別引起注意。

安哥拉這一次的和平協議的成功與否，端視和平協議的各個階段是否能夠徹底執行，讓雙方皆能接受最後的安排與結果。通常，一個和平協議包括幾個主要部份：（一）停火協定的達成、（二）解除武裝、（三）新的政治安排。在停火協定的達成

註⑥ 兩個較爲重要的 UNITA 分裂出的組織是國會領導人 Abel Chivukuvuku 爲首的 Platform for Understanding 及代表薩文比簽署盧沙卡議定書的 Eugenio Manuvakola 領導的 UNITA-Renovada。

註⑦ Spears, "Angola's Elusive Peace," p. 568.

註⑧ *Ibid.*, p. 569.

註⑨ David Simon, "Still Waiting for Peace," *The World Today*, Vol. 57, No. 1 (January 2001), p. 19; Manning, "The Collapse of Peace in Angola," p. 211.

方面，雙方必須要能接受未來的各項安排，才會願意主動結束對抗。同時，停火協定的監督亦是和平協議是否能夠成功的關鍵。這項工作究竟應由聯合國亦或區域組織，或是中立的第三國來執行，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在解除武裝方面，該如何執行方能讓所有的武器徹底繳交，是最受關切的議題。此外，解除武裝後的叛軍游擊隊及其家人生活與工作的安排，及如何重新融入社會等問題，也需要正視。當然，游擊隊解除武裝後，該如何重新編入政府軍，是難度最高的挑戰。在新的政治安排方面，是否要舉行選舉，何時舉行選舉，及選舉的形式及制度皆是考量因素。若是不舉行選舉，叛軍領導人該如何加入政府分享政權，亦必須作妥善的安排。

(一) 停火協定的達成

當薩文比猝死的消息剛傳出時，UNITA 還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繼續武裝抗爭，認為若是要達成停火，責任是在杜桑托斯。換句話說，MPLA 必須提出一個能夠讓 UNITA 接受的和平方案，停火才有可能。為了讓 UNITA 願意進行談判、達成停火協定，杜桑托斯還在二月底特別訪問美國，尋求華府的支持，希望布希政府能給 UNITA 一些壓力。三月中，安哥拉政府片面宣佈停止對 UNITA 的掃蕩行動，並允諾給予叛軍特赦。由於 UNITA 在薩文比死後，出現了群龍無首、權力真空的情形，因此對未來是否能夠持續對抗 MPLA 不具信心，而終願意回到談判桌，在四月初簽署停火協定。

(二) 解除武裝

有關 UNITA 游擊隊的解除武裝問題，聯合國負責安哥拉事務的副秘書長甘巴里 (Ibrahim Gambari) 表示聯合國將在安哥拉全國設立二十七站，協助近五萬的 UNITA 游擊隊和他們的家人解除武裝。不過，聯合國所提供的將是人道方面的協助，如糧食與衣物的供應及醫療衛生的服務，而不是監督武器的繳交，後者完全由政府軍負責。這或許和過去兩次和平協議由聯合國維和部隊負責解除武裝，但卻無法有實際成效，而使和平協議失敗有關。MPLA 政府似乎下定決心，要確定對解除武裝有更多的掌握。此外，政府也預備將大約五千名的叛軍納入政府軍和警察的編制，其餘的則是接受職業訓練，在有了工作的能力後，得以重新回到社會，不再成為動亂的製造者，反是貢獻社會的新力量。觀察家預估這項解除武裝及新的整合行動的完成，至少須要八個月到一年才能完成。因此，MPLA 是否能比聯合國維和部隊在執行上更具成效，要到二〇〇三年夏天後才能作客觀的評估。

(三) 新的政治安排

在未來的政治安排方面，杜桑托斯總統已承諾要舉行大選。不過由於安國各處的地雷遍佈，仍待清除，且交通建設遭到破壞，再加上民衆的戶籍資料不完全，因此不可能立刻舉行，而會有所耽擱。根據媒體報導，新的大選至少要在兩年後方能舉行。在這段期間，藉著部份 UNITA 新領導人的參與政府，雙方可以就未來的憲政體制進行協商。同時 UNITA 如何由一個叛軍游擊隊轉變成為參與民主政治的政黨，也是和平協議的一大考驗。

柒、結論及和平展望

根據以上的討論及分析，在導致內部衝突、內戰爆發及內戰持續因素方面，安哥拉雖然也和其他許多非洲國家一般，脫離不了族群及地域方面的分歧，但卻沒有宗教信仰方面的衝突。事實上，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包括將人民分成混血、同化、和原住民等以及鼓勵移民的政策、里斯本政府拒絕讓安哥拉獨立所引起的革命戰爭、及在政權轉移時脫卸責任的作法，才是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

在影響內戰走向的區域及國際因素方面，安哥拉周邊的非洲國家雖然大多捲入其內戰衝突，但真正造成內戰持續及影響其走向的卻是冷戰對抗的美國及蘇聯，以及其各自的代理人—南非及古巴。不過在冷戰結束、南非和古巴分別撤出納米比亞和安哥拉後，薩文比在被國際社會孤立下，仍然不願放棄UNITA的武裝抗爭，顯示出內戰是否能夠結束，和派系或叛軍領導人的個人特質有密切的關係。

安哥拉在九〇年代的兩次和議及一次總統選舉，皆未結束內戰，達成真正的和平，可見本文所提出的第二種結束內戰的方式並不適用於安哥拉。UNITA和MPLA政府自安哥拉獨立以來就各有固定的統治區域，幾乎和內戰結束的第三種方式類似，不過雙方並沒有像索馬利亞內戰諸方是先達成和平協議，才有分享治權及統轄領域的安排，而是自然發展的結果。

安哥拉的內戰歷經幾次和平協議皆未能達到終結的目的，薩文比也沒有接受一九九二年民主選舉的結果，而重啓戰端。分享政權的嘗試，並沒有成功。^⑩若是目前新的和平協議能夠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薩文比已從內戰衝突中消失。他的遽然死亡，幾乎等於內戰的一方獲勝，但事實上UNITA並未被擊敗，而是因精疲力盡，才願意加入政府，結束內戰。安哥拉的例子比較類似內戰結束的第一及第四種形式的混合。

若薩文比沒有被擊斃，或許安哥拉內戰還無法結束。美國政策的改變雖然可以對薩文比形成壓力，但卻不能強迫他回到談判桌，也無法讓UNITA放棄武裝抗爭。安哥拉在冷戰結束後的發展，可以說是「大人都已握手言和，小孩卻仍抵死對抗」的一個反諷。蘇聯早已瓦解，美國也有中東及南亞等更重要的地區要擔心，但是安哥拉內戰的雙方，特別是UNITA卻無法接受現實，讓這個西南非礦藏資源相當豐富的國家自獨立以來就長期處於內戰的狀態，成為東西霸權對抗、區域衝突、以至於個人恩怨下的一個犧牲品。根據估計，至少有五十萬左右的安哥拉人在這個內戰中喪生，另外一百多萬人則是被迫遷徙他處，其他財產的損失建設的破壞更是讓這個國家百廢待舉。因此，在內戰終於結束的今日，一個有效的重建計畫及可長可久的和平發展，應是飽受戰亂之苦的安哥拉所亟需達成者。

安哥拉停火協定中解除武裝的執行，需要龐大的財政支出，才有可能順利的完成，

註^⑩ Mats Berdal, "The Resumption of Civil War in Angola,"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5, No. 6 (June 1993), p. 284.

因此亟待國際社會的奧援。不過，安哥拉本身的資源豐富，特別是石油產量頗為豐富，應有足夠的收益支付解除武裝之所需。過去由於內戰的耗費及杜桑托斯政府本身的貪污腐敗，而造成政府的財政窘境，如今內戰結束，國際社會是否願意作出援助，端視杜桑托斯能否展現廉能政治，說服最有可能提供援助的西方國家伸出援手，這將是安哥拉政府必須努力的方向。

在一個長期內戰的情況下，交戰雙方的領導人通常極難有誠意達成和平協議。即使達成和平協議，也因互信基礎不足而遭受破壞，難以持久。研究和平協議的觀察家指出，內戰的結束往往是因為一方的領導人出現變化，而產生了新的契機。薩文比的猝死，提供了安哥拉自獨立以來最佳的和平機會，MPLA 與 UNITA 應加以把握，讓安哥拉人民獲得真正的和平，得以重建家園，進行經濟建設。

安哥拉在內戰結束後，不單讓四十年來的動亂告一段落，使得安哥拉人民可以休養生息，社會及經濟秩序可以獲得重建，也讓它有機會較為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二〇〇二年年底當選聯合國安理的非常任理事國，並在二〇〇三年有關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的爭議方面，動見觀瞻，備受重視。安哥拉的重建工作，在未來仍需面對許多艱鉅的挑戰。過去美國重視安哥拉，當然和冷戰期間和蘇聯的對抗有關。在這東西對抗的因素消除後，安哥拉由於有豐富的石油蘊藏，或許還不至於被完全忽視。

* * *

(收件：92年5月5日，修正：92年5月21日，接受：92年5月30日)



Angola's Civil War and Peace Accords: 1975-2002

Chen-shen J. Yen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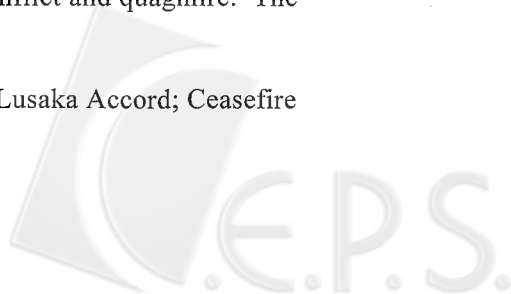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arch 2002, Jonas Savimbi, leader of the rebel guerilla force-UNITA was killed by the government forces of Angola. The ruling MPLA government subsequently made a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ceasing military actions and indicated that it was willing to give amnesty to the rebels to reach reconciliation. The two sides reached ceasefire agreement in April and immediately started the process of disarmament, paving the way for the upcoming national elections in two years.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1975, Angola has experienced a protracted civil war. Three times MPLA and UNITA signed peace agreements and in the end failed to end the conflict. Most African wars in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can be classified as civil wars or revolutionary guerilla warfare. Many of these spread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or witnessed these countri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upporting one warring side, thus making a local conflict a regional one. Very few of them involved countries outside the region or military intervention by foreign forces. Angola was such an exception. Its civil war was a leading case of East-West conflict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South Africa and Cuba sent forces directly into Angol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were indirectly involved. Similarly, all of Angola's peace processes were brokered by international forces. Angola's conflict did not stop despit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wo peace accords were reached in the 1990s, yet both failed to bring the conflict to a close. However, with the sudden death of Jonas Savimbi, there seemed to be an opportunity to end this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quagmire. The peace process has never looked brighter than now.

Keywords: Angola; Jonas Savimbi, MPLA; UNITA; Lusaka Accord; Ceasefire Agreement; Disarmament



參考文獻

- 金神保 (1971), 「葡屬安哥拉的民族主義運動」, 《問題與研究》, 11: 1, 61-64。
- 張麟徵 (1975), 「安哥拉戰亂的回顧、分析、展望」, 《問題與研究》, 15: 6, 53-59。
- 張麟徵 (1975), 「安哥拉戰亂何時了?」, 《問題與研究》, 15: 3, 68-74。
- 楊逢泰 (1976), 「安哥拉戰亂的餘波」, 《問題與研究》, 15: 6, 49-52。
- 楊逢泰 (1976), 「安哥拉戰亂面面觀」, 《問題與研究》, 15: 5, 43-48。
- 劉天均 (1989), 「古巴自安哥拉撤軍與那米比亞獨立—兼論西南非區域安全問題」, 《問題與研究》, 29: 3, 46-57。
- 嚴震生 (2003), 「賴比瑞亞的內戰、區域衝突、及國際介入」, 《問題與研究》, 42: 4, 75-103。
- 嚴震生 (1999), 「九〇年代的獅子山內戰與衝突：國內因素與國際介入」, 《問題與研究》, 38: 12, 29-54。
- Adedeji, A. (ed.) (1999), *Comprehending and Mastering African Conflicts: 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Peace & Good Gover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 Ali, T. M. & R. O. Matthews (eds.) (2000), *Civil Wars in Africa: Roots and Resolution*,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Bender, G. J. (1987), "The Eagle and the Bear in Angol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89, 123-132.
- Bender, G. J. (1978), *Angola under the Portuguese: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London: Heinemann.
- Bridgland, F. (1986), *Jonas Savimbi: A Key to Afric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Copson, R. W. (1994), *Africa's War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 Armonk & London: M, E, Sharpe, 1994.
- Crocker, C. A. (1992), *High Noon in Southern Africa: Making Peace in a Rough Neighborhood*, New York: W, W, Norton.
- Ebinger, C. K. (1976),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l War: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Orbis*, 20, 669-699.
- Fernando, F. A. (1988), *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reeman, C. W. Jr. (1989),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Foreign Affairs*, 68, 126-141.
- Heywood, L. M. (1989), "Unita and Ethnic Nationalism in Angol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7, 47-66.
- Lin, Y. L. (1990), "The Angola-Namibia Accords: Looking to the Future," *Issues & Studies*, 26, 111-130.
- Macqueen, N. (1985), "Portugal and Africa: the Politics of Re-Engagement," *Journal of*

-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3, 31-51.
- Malaquias, A. (2001), "Making War and Lots of Mon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racted Conflict in Angol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8, 521-536.
- Manning, C. (1999), "The Collapse of Peace in Angola," *Current History*, 98, 208-212.
- Marcum, J. A. (1986), "Angola: Twenty-Five Years of War," *Current History*, 85, 193-196, 229-231.
- Marcum, J. A. (1993), "Angola: War Again," *Current History*, 92, 218-223.
- Martin, P. M. (1989), "Peace in Angola?" *Current History*, 88, 229-232, 246-248.
- McCormick, S. H. (1995), "The Lesson of Intervention in Africa," *Current History*, 94, 162-166.
- Mekenkamp, M., P. van Tongeren, H. van der Veen (1999), *Searching for Peace in Africa: An Overview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Platform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Pazzanita, A. G. (1991),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ss in Angol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9, 83-114.
- Pereira, A. W. (1994), "The Neglected Tragedy: The Return to War in Angola, 1992-3,"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2, 1-28.
- Rothchild, D. and C. Hartzell (1991), "Great- and Medium- Power Mediations: Angol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8, 39-57.
- Spears, I. S. (1999), "Angola's Elusive Peace: The Collapse of the Lusaka Acco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54, 562-581.
- Tvedten, I. (1993), "The Angolan Debacle," *Journal of Democracy*, 4, 108-118.
- Tvedten, I. (1992), "US Policy Towards Angola Since 1975,"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0, 31-52.
- Williams, A. (1993), "Negoti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 in D. Smock (ed.), *Making War and Waging Peace: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7-217.
- Wright, G. (1997), *The Destruction of a Nation: United States' Policies Towards Angola Since 1945*, London and Chicago: Pluto Press.

